

怀真集

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013031201

K825.81

77

学历史学系
编

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

墨壘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北航

C1636629

K825.81
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309-09489-3

I. 怀… II. 复… III. 朱维铮(1936~2012)-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840号

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责任编辑/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1.5 字数 537 千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89-3/K·399
定价: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36629

序 言

每当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离开，作为校长的心情是最纠结的。

朱维铮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一年了。朱先生的离世，对复旦、乃至对整个学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先生于复旦大学大力振兴人文学科的关键时期离世，我切实感受到了没有朱先生的复旦多了一丝寂寞和忧愁，复旦的发展太需要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建言、献策、指导和批判。

我对朱先生的学问，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来作任何评述，历史系的同志们要我为朱先生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写几句话，我只能谈一点我的感受。尽管我和朱先生的学科相距太远，但我和《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对于一位大师，我们外行“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他的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遗产’。”这种“气场”和“遗产”就是一种久违了的“士人风骨”。我认为，“风骨”至少是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首先体现在讲真话的巨大勇气。我和朱先生原先并不熟悉，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师辈，加之我是自然科学家，朱先生的学问对我来说太过深奥。因此，我只能以景仰的心情来阅读他的《走出中世纪》，从而来间接地了解朱先生。2009年初，我从国务院学位办回来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向朱先生请教复旦人文学科的发展理念而冒昧登门造访，领略大师风采。后来又在医院聊过数次，内容不外乎关于人文学科的治学之道和复旦的人文学科传统，以及关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等等。每次谈话都获益匪浅，但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率真、求真、认真，乃至有些顶真的态度。他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

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

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是十分贴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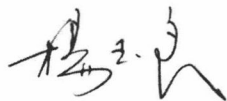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还体现在“为学术而学术”、毫无功利性的治学态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术学科的观点来功利地看待人文学科，对我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它也不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务”，“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我首次与朱先生面谈时他也表达了要“重拾纯学术大旗”的宏愿。他对我说：“纯学术很重要，它可以弘扬传统，启迪思想。当你讲历史用于功利目的时，那么它和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所以，在2010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我发出了“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的感慨。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更表现在他对学术的诚笃，从不为服务于某种目的而“扯淡”。说真话固然很难，不说假话也还过得去，最为可恶的是“扯淡”。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哈里·G·法兰克福的阐述，“扯淡”的危害性远大于“撒谎”，因为“撒谎者”的内心还承认一个“真”的存在，而“扯淡者”从根本上漠视“真”的存在；“扯淡”是一种欺骗性的表述，但未到“撒谎”的程度，因而能规避因“撒谎”可能招致的道德上的谴责。在我看来，“扯淡”完全属于毫无道德的“工具理性”范畴；“扯淡”需要高超的技巧，因而“扯淡”在学界常常出现。以我的体会，学界的“扯淡”，表现不外乎“造神”和“造魔”。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造神”或“造魔”，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体现，都是“学界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造神”和“造魔”的目的几乎是完全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将“神性”赋予给被捧的一方,将“魔性”赋予被贬的一方,以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似乎“合情合理”地达到某种目的。朱先生深知其危害性,不仅自己从不“造神”和“造魔”,还不时地呼吁“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神”,“造神运动可以休矣”,……。

在我看来,现如今“神话”不断破灭,信者大不如前。因此,当今更要警惕的是“造魔”。因为“造魔”的手法就是在被评论对象的头上先摞上一顶可怕的“帽子”,随后就可以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对被评论对象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贬斥、威胁,从名誉上搞臭,乃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依我在和朱先生的闲聊中积累的认识,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如若今天他还在世,他一定也会呼吁“也不要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魔”,“造魔运动也可以休矣”!

虽然大师已然远去,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士人风骨”,就是复旦学术求“真”精神和复旦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我期待朱维铮先生所代表的“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永远在复旦高高飘扬!



2013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杨玉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目 录

杨玉良 序言 / 001

朱维铮教授学术生平 / 001

李天纲 旦复旦兮忆吾师 / 006

王 尧 纪念涔涔之士朱维铮先生 / 021

余子道 忆朱维铮先生青年时代的二三事 / 023

傅敏怡 朱先生片忆 / 028

汪荣祖 悼念朱维铮教授 / 031

刘志琴 特立独行朱维铮 / 032

王家范 悼念朱维铮先生 / 036

王守常 忆维铮先生 / 040

王汎森 记忆中的朱维铮先生 / 042

虞云国 书名联挽朱维铮先生 / 046

施宣圆 忆朱维铮先生二三事 / 048

董秀玉 朱维铮先生与三联书店 / 063

邓正来 忆大哥维铮先生 / 067

李 零 维铮先生二三事 / 069

葛兆光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在往日书信中怀想朱维铮先生 / 072

- 冯锦荣 朱维铮先生忆拾 / 077
- 茅海建 记朱维铮先生 / 085
- 王庆其 深深水，静静流，悠然远去
——追念朱维铮先生 / 089
- 张建智 追思朱维铮先生 / 094
- 陈麦青 人有个性魅力 书见学问担当
——纪念朱维铮先生 / 098
- 魏承思 亦师亦友朱维铮 / 101
- 张隆溪 “走出中世纪”的启示
——怀念朱维铮教授 / 104
- 刘梦溪 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
——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 111
- 姚大力 贯通于周秦、晚清之间
——悼念朱维铮教授 / 116
- 罗志田 一位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
——纪念朱维铮先生 / 119
- 葛兆光 学“不随术变” 坚持启蒙主义立场 / 125
- 蒋维崧 也许这是他最后的学术文字了…… / 128
- 金文明 学者风范
——朱维铮教授的一封信 / 132
- 魏达志 追忆恩师朱维铮
——回忆在朱老师身边学习与工作的日子 / 137
- 邹振环 朱维铮先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史” / 146
- 苏 勇 三事忆朱师 / 159

- 马 勇 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 / 162
- 闵道安 恪守自己的理念走向世界
——追忆朱老师 / 174
- 李天纲 学术生命仍盎然
——悼朱维铮师 / 177
- 徐洪兴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忆朱维铮师 / 183
- 杨志刚 从学记
——缅怀朱维铮老师 / 189
- 陈居渊 朱先生的经学史研究 / 198
- 廖 梅 导师朱维铮先生教我念书 / 202
- 王维江 二十年的师生缘 / 206
- 王东杰 以“书”为中心的思想史 / 217
- 吴通福 回忆朱先生给我的教诲和关怀 / 221
- 钱文忠 别样的学人优雅 / 226
- 邓志峰 雪月之静穆与庄严
——怀念朱师维铮先生 / 233
- 刘文楠 朱先生和魏教授 / 243
- 姜 鹏 缅怀恩师 / 246
- 金光耀 为朱维铮先生做口述 / 250
- 傅 杰 八卦碎片 / 254
- 汪堂家 史家的情怀
——记朱维铮先生二、三事 / 287
- 张 化 朱先生带我做研究 / 290
- 潘光哲 从维铮先生游的点滴 / 293

黎汉基 拒绝平庸的思想斗士

——怀念朱维铮先生 / 297

王 韧 悼念朱维铮先生 / 305

秦 敏 徐冠群 朱维铮先生学术编年初稿 / 314

附录一

秦 敏 朱维铮先生病中谈话 / 357

朱维铮先生的最后一课 / 362

傅敏怡 在授予朱维铮先生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祝辞 / 378

朱维铮 接受汉堡大学荣誉博士的谢辞 / 381

吕 森 在授予朱维铮教授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主题演讲 / 383

王维江 真正的对话与理解 / 388

附录二

历史学家朱维铮去世 生前曾感叹“假大师满天飞” / 395

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 / 399

治古不忘今

——记已故著名学者朱维铮 / 404

朱维铮：远去的那一道大学风景 / 407

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 / 411

三次谈话，永难忘怀

——追忆朱维铮先生 / 416

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 420

- 怀念思想者朱维铮 / 422
- 学者朱维铮：是“大师”不是神 / 426
- 和朱维铮教授的最后一面 / 434
- 朱维铮结缘《大师》的背后是担当 / 436
- 朱维铮的学术与人生 / 439
- 朱维铮：“硬骨头”的思想启蒙者 / 453
- 巨星陨落 山河含悲
——怀念文化大师朱维铮先生 / 459
- 朱维铮先生与中西书局 / 462
- 朱维铮的意义 / 464
- 朱维铮：说我“低调”可以，称我“大师”我不认
——聆听朱维铮先生的月旦评 / 466
-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475
- 高 晞 吾师已逝 师德长存（代后记） / 481

朱维铮教授学术生平

朱维铮（1936—2012），男，汉族，祖籍江苏无锡。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高等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专门史博士生导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

朱维铮先生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于本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助教。1979年升为讲师，1985年升为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朱维铮先生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朱维铮先生治学早受学界前辈亲炙。留校之初，就担任著名学者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多受瞩目。1960年代，教育部委托周予同先生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先生为主要助手，为此博研典籍，贯通古今，转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国历史文选》出版后，被评定为教育部“优秀教材”。作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沿用数十年中，屡经修订，累计发行量达50余万册。

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朱维铮先生继承了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发展出中国史学史课程，是复旦历史系特色。2005年，朱维铮先生领衔承担“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研究课题，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为此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系列学术论文，

先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体现了史学史研究的深厚造诣。早年，他为《中国十大史学家》撰写的司马迁篇，通过《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众多司马迁研究中，独具特色。另外，《论三通》一文（《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也是朱维铮先生极具代表性的史学史论文。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他承续周予同一脉，无论环境艰难还是喧嚣，都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一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朱维铮先生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是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文献。他曾受邀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为重要经学史文献做了提要，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门径。晚年，他担任了《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朱维铮先生在《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等文章和《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指出，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别有创见。

朱维铮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代，为突破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历史研究范式的桎梏，朱维铮先生和各地学术同道一起开拓中国文化史研究。他和复旦历史系同仁组建了国内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锐意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1986年初，在复旦组织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国内举办的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被称为是“群贤毕至”的盛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会议论文集。1989年冬天，朱维铮先生再次受学校的委托，在复旦召集了“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当代新儒学”学说和“西体中用”学说，就在那次会议上初为大陆学人所知，见《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朱维铮先生组织编纂了五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荟聚时贤佳文，至今嘉惠后学。此外，他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计28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具有学术里程碑意义。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朱维铮先生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主张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乃至学术史、经学史，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恒定不变的“传统”，要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

事人的真实经验。这一思想贯穿在朱先生的研究和教学中，体现在他指导的学生论文中。

朱维铮先生倾三十年之功撰写的《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后来的《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都集中了他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精思, 以至一版再版, 嘉惠后学。不拘陈说, 用新的史料、方法和思想去审视那些靠不住的旧结论, 是朱维铮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走出中世纪》是一部论述明清帝国专制及近代历史变迁的力作, 表达了“文革”后学术界经内省后的反思精神。其中反省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问题、专制体制下的人心和人性问题、满汉矛盾中的社会危机问题、“西学”输入的艰难处境问题等等, 都因其独到的眼光, 意外的材料, 尖锐的思想, 深湛的功力, 影响了几代学人。出版后不久, 即被翻译成英文,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朱维铮先生新著《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社、中西书局, 2010年), 是他最后几年勉力写作、终于完成的力作。《重读近代史》是他对中国近代史发表系统看法的发覆之作, 表达了对如何突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诸多看法。朱维铮先生用考证、发微和总括的笔触, 描写了中国近代史如何陷入困境, 指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无出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 朱维铮先生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既推动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 也将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1993年, 朱维铮先生在复旦召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 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此外, 还主持了《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1年)、《徐光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等重要文献的出版, 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

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 是朱维铮先生毕生致力的领域之一。他对晚清经今文学旗手康有为、经古文学殿军章太炎的研究, 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朱维铮先生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对重新认识康有为在近代中国学术中的影响有很大帮助; 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与姜义华合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厘清了大量古典、近典, 使艰涩难懂的章太炎学说能被理解。他还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廋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其长篇导论, 理清《廋书》三次结集中的诸问题, 为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朱维铮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着力很多, 精校详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

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读物。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执行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一辑十种，钱锺书名誉主编，199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为每本著作撰写长篇导论，均堪为入学门径。十篇导论和相关论著结集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代表了朱维铮先生清学史研究的成就。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他与台湾作家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台湾版名为《未完成的革命》），成为活动期间的最畅销著作。他还撰写了《壶里春秋》，参与编撰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孔子思想体系》等作品。朱维铮先生还曾担任《学术集林》、《九州学林》的编委工作。

朱维铮先生的学术成就很早为海内外学术界认可，是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对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1987年以来，曾先后受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图宾根大学埃森文化研究所、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多所知名大学、权威学术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还担任北美《亚洲评论》的顾问。朱维铮先生在国内最早接待海外学人，经他指导的留学生不少都成为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程艾蓝。而经先生推荐到海外留学、访学的学生，也有不少成长为国内外学界的著名学者。

2006年7月14日，朱维铮教授七十寿辰之际，德国汉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是该校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学者。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Michael Friedrich）和埃森文化研究所所长吕森（Jörn Rüsen）教授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朱维铮先生则谦称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朱维铮先生和吕森教授曾以“全球化视野下的人文主义”为题，开展过跨国合作研究，完成《人文主义》第一、二、三章，由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闵道安（Achim Mittag）翻译成德文。

朱维铮先生为师五十二载，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是一位卓越的史学教育家，他坚持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他不拘一格、提携后进。先生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导的海外学者，不少已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2008年起，朱维铮先生领衔开设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强调要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理解中国历史，高屋建瓴、引领初学。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疗后坚持上课，提早到教师休息室缓坐半小时，一丝不苟地讲完了人生的最后两节课。

朱维铮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受邀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学术顾问，

他倾注了全力，既顾且问，帮助栏目选题、策划、审稿。先生晚年数次抱病工作，帮助编导们让《大师》臻于完美。对于大师的定义，朱维铮先生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因此“谁都不能自封或他封为大师”。大师的特征，就是坚持独立之思想。

朱维铮先生治史五十七载，早期深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髓，长期盘点经史子集、别裁清学，稔于乾嘉考据之法、谙于现代诠释之学，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他把清代“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与现代学术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学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才能回应当代人的兴趣。他善于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关于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立论，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

朱维铮先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以学术为生命。去世前两年，他着手对《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作大幅修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校订样稿，批注满纸。他一生自尊风骨，延续了老一辈学人风范。课间饮水，必背对学生；批改学生文稿，红笔淹墨；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海外学者赞誉先生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朱维铮先生在学术界、思想界和史学教育领域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从未离开过复旦大学，他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已经与复旦融为一体，他自称是“复旦人”。

朱维铮先生一生身体力行，履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先生曾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改变契机，是在“文革”中期领悟到：“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他独立思考、求索真理的批判精神，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史家品格，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学者风骨，这便是一位“不懈探索真理的纯学者”一生的写照。

且复旦兮忆吾师

李天纲

《中国近代学术史论》是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先生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为各书写的“导言”，加上相关论文的结集，曾名《求索真文明》。这次再为增订若干文章，都为一册，以飨读者，兼怀斯人。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为题，首次结集出版朱老师的这部心血之作。朱师更愿意用《晚清学术史论》为题，但是出版社希望有一个出挑点的书名。古籍社的社长、总编和编辑们都很熟悉，朱师便和大家一起不得已，从俗地想了个“求索真文明”，放在正题位置。这次再结集，用《中国近代学术史论》作书名，是朱师在病榻上的本意，更加妥帖。提起书名往事，也想说明：朋友之间的朱老师，其实是随和的，既能商量，也能妥协，并不像有人传说的“难合作”。

记得1987年底的一天下午，朱老师把我叫到家中，说：“又替自己套上了一条绳索，给三联书店编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说：这套丛书，是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先生提议的，还说动了钱锺书先生做名誉主编。当时，朱师和庞朴先生合作，在京、沪两地共同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人的约定，是准备五年出50种，十年100种，超越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1888—1979）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朱师独自执行主编，带研究生们一起做。“用五年时间，先编30种。以后是不是也编个100种，就看你们了。”五十初度，刚在“知天命”之年的朱师，那些年做学问，真的拼命。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热”出现后，大陆学术界急需这样一套资料书。后来，董先生把这套书从北京带到香港三联，利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发行网络，由大陆学者编辑这套丛书，朱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文革”刚结束，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这个专业在全国公认领先。庞朴先生几次讲，联合国有个“中国文化”项目落到他头上，查遍全国，只